

租利两得：新质生产力、新国富论 与乡村振兴

周立 罗建章

摘要 不同于利润经济或寻租活动,租值经济是因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引发的非生产性获利,是超越亚当·斯密《国富论》所言的以利润赚取为中心的国民财富更大来源。以租值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新国富论,将为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将租值经济与利润经济相结合,促进“租利两得”,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村地区同时发展利润赚取和租值获取两种经济,促进“租利两得”,需要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中进行金融创新,在肯定资源产权、资产产权和金融产权的基础上,发展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三大经济形态,让新、老国富论一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租值经济;租利两得;乡村振兴;国富论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①如何让国家有财富,国民有恒产,需要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以自然哲学为方法论基础,把符合“自然秩序”原则的“利己心”作为出发点,认为激发人类行为的利己心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以追求利润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增长,最终也会带动社会福利增长。《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围绕《国富论》讨论的到底是“国家财富”还是“国民财富”,也有长时期的争论^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财富的性质和统计方法上。关于“国富”,重商主义时期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认为社会财富来源只是土地和劳动。之后的经济学家,不断将这一讨论扩充到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数字、制度等生产要素。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较为通用的财富估计方法,包括所得法、遗产法、盘存法、普查法等。到了20世纪40年代,伴随物价波动和统计技术进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渐确立,“国富”不再是国民经济核算思想,而转变为技术指标了。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是根据不同产业部门的特点和资料来源情况,分别采用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等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标准数据,

作者简介:周立,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罗建章,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北京,100084)。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项目“跨界合作与整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XNL012)。

^①《孟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6页。

^②刘国光:《关于国富、民富和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些思考》,《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然后加上国外净要素收入得到的^①。

《国富论》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引领了200多年来基于自然秩序的“自由放任”经济理念,并促进了追逐利润的经济实践,也引发了中西方经济思想之间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有研究指出,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深受法国魁奈、杜尔阁等重农学派的影响,而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科学”思想源自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与“无为而治”。中国典籍中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斯密、魁奈更为深刻^②。

笔者无意卷入这种财富核算和经济思想史的争论,但愿意搭建起财富来源对话和中西方经济思想对话的桥梁,并在理论对话中推陈出新。具体来说,本文将展开两个理论对话,一是财富来源的对话,通过对话以利润赚取为核心的国富论,提出以“租利两得”为核心的新国富论;二是对话以国富论为理论基础,以利润赚取为核算目标的生产要素分析法,提出租值获取为财富来源的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组合分析和超越生产要素分析的非生产性获利分析体系。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就此,本文还在实践层面讨论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的金融创新,实现“租利两得”。

一、《国富论》、生产要素分析与利润经济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其中有三大奠基性贡献:一是确定了经济研究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土地和资本,开创性地将资本视作生产要素之一。二是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说,倡导经济自由主义,指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地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三是指出劳动分工能够提升市场效率^③。这些贡献成为以产业利润为核心的利润经济的理论基础,其思想延续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范式。生产性获利是《国富论》关注的中心,对于本文更为关注的非生产性获利,早期研究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线索。比如,穆勒(Mill)提出了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相互独立的观点,认为生产规律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自然规律,而分配规律则是与人类天性相联系的社会规律^④。

(一) 自然规律、生产要素分析与利润经济

《国富论》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在书名中,就提示了他最关心的两个领域:国民财富的性质、国民财富的来源。书中解释了生产效率提升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则是生产规模扩大、效率提升,进而形成财富的关键。在一个自由经济体系中,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推动了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由此,经济学从古典哲学和伦理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历经多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形成了今日的现代经济学。以此为基础的几个里程碑式理论有:(1)李嘉图(Ricardo)的劳动价值和比较优势论,解释了相同的单位劳动力为何因其不同的禀赋带来的利润差异^⑤;(2)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

^① 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国富”学说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② 刘刚、廖正贤、梁晗:《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中国思想溯源——〈国富论〉与〈货殖列传〉〈道德经〉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③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④ [英]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⑤ [英] 李嘉图·大卫:《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5、64—68页。

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与资源限制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经济学如何在约束条件下开展最优配置^①; (3)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相互独立的生产费用说; (4)边际革命,序数效用论取代基数效用论使得经济学对个体偏好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推动经济学由古典经济学迈向了新古典经济学; (5)凯恩斯主义,凯恩斯(Keynes)提出了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的“看得见的手”^②; (6)萨缪尔森(Samuelson)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③。在《国富论》开启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围绕有限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形成了体系化的新古典分配理论。

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核心是在既定的条件约束下,探讨要素供给与要素需求之间如何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均衡。在收入初次分配理论中,边际生产力论和供求均衡论处于核心地位。根据边际生产力论,不同生产要素带来的产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并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供求均衡论则强调,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边际收益产品,由此决定厂商的生产要素需求,进而有不同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最终形成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收益。这一过程可由下式表达:

$$\begin{aligned} \text{Max}\pi(L, K, \dots) &= P \cdot F(L, K, \dots) - w \cdot L - r \cdot k - \varepsilon \\ \text{s.t } \text{MRP}_L &= \frac{\partial F(L, K)}{\partial L} \cdot P = w, \text{MRP}_K = \frac{\partial F(L, K)}{\partial K} \cdot P = r \end{aligned}$$

其中, $\pi(L, K)$ 是企业的利润, P 是产品的市场价格; $F(L, K)$ 是生产函数,表示生产过程中的总产出; L 是劳动投入, K 是资本投入, w 是劳动的价格(工资率), r 是资本的价格(利率)。在均衡状态下,企业会调整劳动和资本的使用量,直到达到利润最大化。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关注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以优化生产决策和提高生产性获利,但不涉及非生产性获利部分。其中非生产性获利通常指的是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或不增加社会总财富而获得的部分,即“租”。新古典经济学重视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对与资源控制或特权有关的“租”关注不够,如资本利得、垄断利润及非生产性支出。这些都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关注生产性获利的同时,揭开国民财富积累中非生产性获利的“面纱”。

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生产要素分析法的研究扩展主要体现在对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的深入分析,通过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不同生产要素如何根据其其对产出的边际贡献来获得相应报酬。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一方法不断扩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新的经济现象。首先,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将“供给—需求”分析置于核心位置,这导致了对生产要素的分析更加注重其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中的作用^④。其次,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入边际生产力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机制。这一理论认为,每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如工资、利润、地租)取决于其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这促进了对生产要素市场和收入分配的深入理解^⑤。再次,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产业分类的重新认识。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区分变得更加明

①[英]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②[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页。

③[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④白暴力、张栋:《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100年的弯路》,《财经科学》2006年第8期。

⑤吴宣恭:《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确^①。生产要素分析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帮助经济学家分析不同产业的生产函数和要素需求,以及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还包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例如,索洛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除了资本积累之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一模型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分析法,使其可应用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析中。

然而,生产要素分析法无法回避一些仅用要素投入与产出(生产性获利)来解释的理论挑战。为了实现要素收入分配的平等,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试图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政府干预也会带来政府失灵问题。无论何种理论,可能都要面对新的现实挑战,即财富来源可能不仅是利润(生产性获利),还有租值(非生产性获利)。不同于以产业利润赚取为核心的经济(本文称之为“利润经济”,Profit-earning),因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引发的非生产性获利,可能成为国民财富的更大来源。本文将这一租值获取的经济形态称为“租值经济”(Rent-sharing)^②。

(二)分配规律与地租理论的提出

在对“利”的讨论存在不足时,已有的经济学说对“租”的讨论已散落在分配规律的分析中。租是“为使用要素而支付的价格”。亚当·斯密将地租定义为“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而且认为是一种“垄断价格”。依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地租被视为一种剩余,既不构成生产成本,也不影响产品价格。但在现实中,对于租用土地的生产者而言,租金无疑是成本的一部分;当土地作为一种可变投入时,地租也会反映到产品价格之中。因此,利润是由生产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共同决定的,产品的价格则包含了“租值”。张曙光讨论了租值的来源^③。他指出,穆勒认为许多额外利润具有租金的性质,这是将租金概念推广到所有生产要素的关键一步。在古典经济学中,租金理论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即便如此,在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框架下,仍无法解释“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之类的自然增值现象;也无法解释古代社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种对自然增值部分分配不公的现象。如果只是以生产要素为分析手段,就无法解释农民作为生产者获得收成但不能得到合理回报的情况。换言之,以生产性获利为财富性质和获取手段的利润经济概念,和以《国富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都无法解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自然增值现象,以及重税、地租、社会等级制度等社会增值原因带来的非生产性获利。这就需要引入租值经济概念以及构建新国富论。

实际上,已有的理论也有对租值或者非生产性获利的零星讨论。斯密的《国富论》第11章专门讨论了地租理论,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因出租土地而获得的收入,是土地生产物的一部分,但不是土地生产所必需的。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2章中以“论地租”为标题,提出了级差地租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中系统阐述了地租理论。尽管他们对租值的理解和态度存在很多分歧,但共同奠定了租金理论的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分析法面临新挑战。张曙光指出,新经济中“使用而非拥有”的模式,使得拥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变得尤为重要。由此,租值独占转为租值分享,是数字时代对生产要素分析法和租值获取理论的挑战。在数字时代和共享经济中,租值的分配和耗散有了新的变化。租值集聚(Appropriable Quasi Rents Aggregation)与租值耗散(Rent Dissipation,国内也常译为“租值消散”)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租值集聚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资源或财产的价值因有效的产

^①胡晓鹏:《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统计及其结构优化——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视角》,《财经科学》2008年第9期。

^②之前的研究,将资产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的非生产性获利,称为“吃租经济”,而生产性获利,称为“食利经济”。详见周立:《从食利经济到吃租经济:乡村振兴中的金融创新》,《人民论坛》2019年第3期。

^③张曙光:《新经济的发展与租值理论创新——纪念〈佃农理论〉问世五十年》,《读书》2018年第2期。

权界定和资源配置而得以保持或增加。如果政府对租金进行管制,可能会导致租值耗散,因为管制会扭曲市场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但在新经济条件下,租值耗散可能不再是主要问题,反而出现了租值集聚的现象。这是因为在共享经济中,数据、知识等资源具有无限性和使用的非排他性,使得租值可以在不同的使用者之间集聚而不是耗散。相比之下,自然资源的租金源自其稀缺性,是稀缺租金(霍特林租金)。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以往散落的与“租”相关的讨论,应当上升到租值理论的层次。

二、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组合分析与租值经济

(一)新质生产力与可占用性准租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劳动和资本依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这意味着,除了传统的劳动和资本,数据、信息、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要素的有效组合和利用,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分配和收入来源。

参照钟茂初关于生产力跃迁过程的讨论^②,假定生产力由传统生产力 Y_0 和新质生产力 Y_1 组成,那么有 $Y=Y(Y_0, Y_1)$ 。经济增长表示为:

$$\Delta Y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0} \Delta Y_0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1} \Delta Y_1 = \frac{\partial Y \Delta Y_0}{\partial Y_0 \Delta Y_1} \Delta Y_1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1} \Delta Y_1 = \left(\frac{\partial Y \Delta Y_0}{\partial Y_0 \Delta Y_1}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1} \right) \Delta Y_1$$

以此为基础,加入新质生产力的国民财富来源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扩展(ΔY_1)。新质生产力促进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和合理,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的引导,实现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二是新型生产方式的采纳($\frac{\partial Y}{\partial Y_1}$)。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与传统的利润经济模式相比,更加注重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非仅仅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三是租值经济对利润经济的替代($\frac{\partial Y \Delta Y_0}{\partial Y_0 \Delta Y_1}$),即通过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获得国民财富。自然增值指代资源的价值因自然环境变化而发生的增值,与资源所有者的努力无关;社会增值侧重资产价值因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变化而增加,不体现在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存在显著的产出提升。

从利润经济向租值经济的转变,是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它反映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已经超越以一二三产业衡量的产值和利润,主要表现为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部分。租值经济强调的是通过控制或管理某些稀缺资源(如数据、知识产权、地理位置、特定市场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形态的崛起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和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对这些要素的控制或管理可以产生显著的租值。由此,强调使用权、控制权而非所有权的契约形式催生了“可占用性准租”(Appropriable Quasi rents)的概念。“可占用性准租”指的是

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②钟茂初:《“新质生产力”发展演进及其增长路径的理论阐释》,《河北学刊》2024年第2期。

准租中潜在的可占用的专用部分,即超过下一出价最高的使用者的价值^①。准租不同于垄断租金,它不存在超额利润问题。由于专用性资产一旦投资,再将其移动的代价是高昂的,或者对于特定使用者是如此高度专用,以至于如果支付给所有者的价格急剧下降,为资产使用者提供的服务也不会减少。

图1结合上文对租值的阐释,在要素分析法下,资源配置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以有限资源最优配置为逻辑的利润经济中,参与生产部分的要素价格因交易成本的边际递减,带来不参与生产要素租值耗散。租值经济依托控制或管理资源来获取非生产性的租值收益,而不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或资本投入来获取利润。因此,在要素组合法中,获取非生产性收益的交易成本边际递增,导致不参与生产要素租值的边际递增,由此实现租值集聚。前者对应生产性获利的利润经济,即当要素的交易成本递减达到边际值时,租值开始加速耗散,利润经济达到极值;后者对应非生产性获利的租值经济,当资源的交易成本达到边际值时,租值加速集聚,租值经济开始超过利润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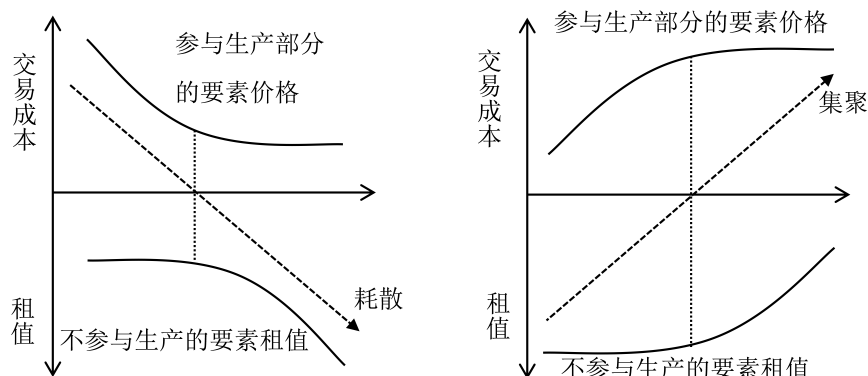


图1 租值耗散到租值集聚的解释

注:两个图示中,上半部分对应资源使用者用于生产性获利的交易成本曲线,下半部分对应资产所有者的非生产性获利曲线。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和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对这些要素的控制和管理可以产生显著的租值集聚效应。租值经济强调的是,通过控制或管理某些稀缺资源(如知识产权、数据、地理位置、特定市场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形态的崛起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平台经济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平台企业通过聚集用户和服务商,创造了双边市场,通过提供中介服务来获取租值。这种模式在没有显著的物理生产活动的情况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交易效率来创造经济价值。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产业利润模式正在面临挑战。一些行业,如制造业和农业,正在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这也意味着它们的经济价值创造方式正在从传统的利润赚取模式转向更加依赖于租值获取的模式。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各行业的可占用性准租,尤其是由知识、专利、数据等高价值资源所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将在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要素组合法

龚斌磊和袁菱苒提出以技术创新导向、农业特征导向和多维目标导向为线索,对农业全要素生

^①Benjamin Klein, Robert Crawford, Armen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21, no. 2(1978), pp. 297-326.

产率的测度体系进行重构^①,其核心是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常规要素嵌入型、现代要素嵌入型、自然要素嵌入型及要素无关型四部分。生产力的形成依赖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生产要素通常是指劳动、土地、资本等有形要素,新质生产力是指在已有要素之外出现了新类型要素,要素的范围和种类得以扩展,且要素供给的侧重点从数量逐步转向质量^②。对此,本文进一步分解扩展,认为挖掘租值经济的空间,除了常规要素和新生产要素部分外,主要在于自然增值部分和社会增值部分。这一分解扩展可用下式表示:

$$\widehat{\Delta TFP}_{it} = \underbrace{\Delta\beta_{1it}(L_{it}+L_{it-1})/2}_{\text{常规要素部分}} + \underbrace{\Delta\beta_{2it}(K_{it}+K_{it-1})/2}_{\text{新生产要素部分}} + \underbrace{\Delta\beta_{3it}(W_{it}+W_{it-1})/2}_{\text{自然增值部分}} + \underbrace{\Delta\theta_{3it}(R_{it}+R_{it-1})/2 + \tilde{\delta}_{it}}_{\text{社会增值部分}}$$

注:常规要素、新生产要素及自然增值计入产业核算的部分,是针对利润经济而言的;自然要素的自然增值,以及财富的社会增值部分(含残差部分),是针对租值经济而言的。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及过去未能计入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形成了新的要素组合分析法,可以帮助理解并超越已有的生产要素价值分析,从而在传统的利润经济基础上,理解租值经济的新形态。租值来自非生产性获利,可以理解为生产要素在特定用途中获得的超过其机会成本的收益。通过生产要素组合分析法,我们可以分析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如何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来最大化增值,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福利。

以农村土地资产增值为例,它的增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增值。自然增值指资产由于自然再生产过程而发生的增值,如绿水青山的生态循环,以及土地因为自然原因(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而逐年增加的价值。自然增值来自自然因素,而非人为因素。这既包括绿水青山的生态循环和修复过程,也包括“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以及石油、煤炭及各类矿产资源超越整个人类生存时代的自然禀赋被发掘利用的过程。一片土地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善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其价值自然上升,这种增值也是自然增值的体现。在要素组合分析法中,可以分析这些要素如何通过其固有特性(如肥沃程度、位置等)对产出产生影响,并评估其对总产出的贡献。二是社会增值。社会增值是指资产由于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而发生的增值,即因为人为因素导致的资产价值增加。社会增值是由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变化引起的,而非资产本身的物理特性或位置变化。

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农民、村集体和政府,有的学者还将开发商和城市居民纳入其中。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原则,学界存在“涨价归公”“涨价归私”和“公私兼顾”三种观点^③。实际上,社会增值来自多种社会因素的变化,且不仅限于土地。例如,创设一二三级市场,促进资源资本化既能利用正规的场内交易,还能创设场外市场,让农村资产进入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过程,就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④。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使得某项资产变得更有价值,或者政策变动,也使得某些资产的使用权变得更为有利可图。社会增值通常与市场供需关

① 龚斌磊、袁菱苒:《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测度与实证》,《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4期。

②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

③ 田双清、姜海、陈磊:《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④ 周立:《以资源资本化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国家治理》2019年第34期。

系、技术进步、法律法规变化等因素有关。在生产要素组合法中,我们可以探讨如何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来适应这些社会变化,从而实现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三)租值经济的“租利两得”机制

进入21世纪后,众多产业相继进入过剩状态,以获取产业利润为核心的利润经济模式动力不足。其原因之一在于,国民财富的增值来源,正逐渐从以产业利润为核心的利润经济形态,转变为由利润经济和租值经济共同驱动的“租利两得”经济形态。这种租值经济,是在资源既定条件下(甚至在新生产要素发掘和更多自然资源获取能力上升的条件下,可以称之为“丰裕”),进行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的租值发掘,从而得到非生产性获利。为了实现以新质生产力带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同时发展利润经济和租值经济,开创出“租利两得”的经济体系。按照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的历史经验,可以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发掘经济发展新动力。通过生态价值化和价值生态化发展租值经济,依托产权地位,可以让乡村获得资源资本化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从而积累财富。

上述有关利润经济、租值经济,以及国富论与新国富论的讨论,可用表1作出总结。

表1 国富论与新国富论之比较

类目	国富论	新国富论
财富性质	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要素发掘	资源既定条件下的租值发掘
财富来源	生产性获利	生产性获利和非生产性获利
分析范式	生产要素分析法	要素组合分析法
租利关系	租变为利,利润经济	租超越利,租利两得
前景	租值耗散	租值集聚

注:为便于对比,狭义的新国富论仅指租值经济部分,行文中多采用广义的新国富论,即包含利润经济和租值经济的“租利两得”经济体系。

由表1可见,在新国富论中,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不仅仅是《国富论》所言假定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要素发掘,以得到生产性获利,形成以利润赚取、租值耗散为中心的利润经济,而且包括在资源既定条件下,进行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的租值发掘,以得到非生产性获利,形成以租值获取、租值集聚为中心的租值经济。不同于利润经济或寻租活动,租值经济是因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引发的非生产性获利,是超越亚当·斯密《国富论》所言的以利润赚取为中心的国民财富更大来源。同时发展利润赚取和租值获取两种经济,促进“租利两得”,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租值经济形态与乡村振兴中的“租利两得”

当资产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逐渐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时,租值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就需要区分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三类经济形态。

(一)不同于“寻租”的三种租值经济形态

前文论及,“租”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早已有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研究了土地地租,并将地租划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其中最为人知的是级差地租。由于土地有肥沃程度、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同量资本投入生产条件不同而面积相同的土地,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收益会不相同,“优等地”和“中等地”所产生的高于平均收益的超额利润,便构成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指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垄断地租指个别条件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地租的特殊形式,具体而言指少量土地因自然条件特别有利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且垄断地租会随着购买者支付意愿和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农业资本家只能获得农业生产的平均利润,而三种地租收益均需要缴纳给土地所有者。可见,土地租金的获得需要具备产权地

位,且土地租金会因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应该说,土地地租是租值的狭义概念。

西方经济学早有制度租金的概念,主要体现为寻租(rent-seeking)理论。寻租主要指依托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经济租)的非生产性寻利。比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不恰当的干预和管制,会妨碍市场竞争,可能为少数有特权者创造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克鲁格(Anne. Krueger)将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谋求这种特权以获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其租金来源于生产要素需求提高,但供给制度性受阻产生的差价。应该说,制度租金也是租值的狭义概念。尽管这是一种不合理或不正当的租值。

租值经济和批评性的“寻租”理论,有某些共通之处,其财富来源都是资产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是非生产性获利。但租值经济并非行政垄断或经济垄断带来的寻租。寻租只是少数人利用其权力,取得超额收入。根据经济学观点,利用垄断地位攫取垄断利润,官员、社会组织或其他个人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寻租行为获得额外收入,这些利润或收入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利润。布坎南和克鲁格提出“租金”概念,就是为了反对这种寻租活动。但是,租值经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寻租经济,二者之间有着显著不同。租值经济依托的是产权地位而非简单的、不合理或不正当的垄断地位,虽然垄断地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产权地位。

本文将租值扩展并客观化和中性化,认为租值来源有两个: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获取以租值为核心的经济形态为租值经济,租值来自资产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所带来的非生产性获利,即在很少甚至没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资产价值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增减的部分。租值经济并不局限于土地租金,而是包含了所有能产生增值收益的资源、专利、资本、制度、组织等。与租值经济相对应的利润经济,是以获取产业利润为核心。利润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生产性收益,通过预付生产要素成本、重新组合、投入生产而形成。租值经济则是资产所有者依托其资产产权地位分享租值。图2以财富价值的微笑曲线为基础,展示了租值经济的三种形态,以及由此引发的“租利两得”三种组合与价值链三种形式。租值获取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而是产权地位的获得:依托资源产权地位,获取资源经济中的资源租;依托产业资本产权地位,获取产业经济发展的经济租(含利润);依托金融资本产权地位,获取金融经济发展的货币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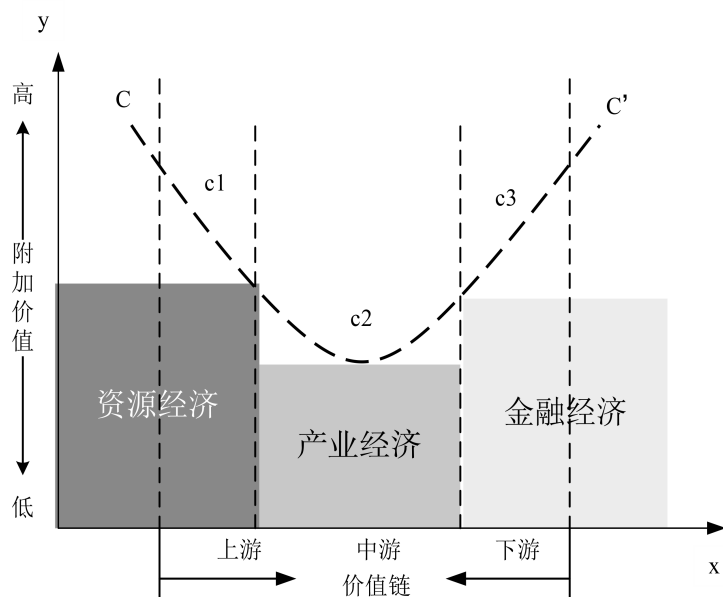


图2 “租利两得”经济的三种形态及价值链

(二)乡村振兴要瞄准主要财富来源

在城市,一部分群体的房产、金融资产因社会增值,占据了家庭财富的7成以上,增值收益远远高于工资收入。因此,尽管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城乡居民的财产、金融资产、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城乡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一个原因,是城市率先进入了租值经济形态,而很多农村还停留在利润经济形态,农民不在以土地增值为主要财富来源的财富收益分配体系内,只能获取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产生的收益,却难以获取财富增值收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近些年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接近8成,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这使得即使大力促进三产融合,基于利润经济的现有收益体系,也难以带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进一步可能影响乡风文明和治理的有效实现。利润经济进入平台期后,也将影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因此,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以农民再组织化为切入点,区分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三类新型经济形态,在肯定农民资源产权、产业产权和金融产权的基础上,推动农民收益体系由“利”向“租”转变,实现“租利两得”,让农村居民在高质量发展中更有获得感。

(三)三大产权和三大产业

认识到租值获取的主要手段是产权地位,就能够在乡村振兴中找到抓手。从农民的角度看,有三种产权地位未能充分赋权给农民,使得农民难以进入租值上涨的分配体系中。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村庄通过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如从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或商业用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村庄的现代化,这些村庄有时被称为“超级村庄”。“超级村庄”的出现,关键在于在村庄土地性质转换过程中掌握好村集体的资源产权、资本产权及信用产权。第一,依托资源产权,发展资源经济。这要求赋予农民同等地权收益,推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这“三块地”入市改革,并以试点的方式逐步铺开、谨慎推进;完善生态资源确权定价模式,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依托,在对生态资源稀缺程度、异质程度、价值增值空间评估的基础上合理定价。第二,依托资本产权,发展产业经济。乡村发展中,“热投资”遇上“冷农民”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收益”与“低分享”的不对等,资本与农民的利益共同体未得到有效构建。因此,在发挥外来资本带动农村地区资源优势的同时,还需赋予和认可农民的资本产权,增强农村资本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和信心,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共治共享经济平台的群众基础。第三,依托信用产权,发展金融经济。一方面要放宽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条件,为农民集中使用资金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要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等媒介硬件,允许农民与外部资本、外部交易主体产生对等交易关系。

(四)租利两得的实践探索

2024年6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强调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服务和福利”的权利。贵州湄潭、山西大宁、福建永春以及重庆全域等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的“三权促三变”和“两山两化”,正是推动发展租值经济,促进“租利两得”的实践探索。图3以上述地方县域三级市场的金融创新为例,来阐明这种尝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四确五定”,积极设租,创设一级市场。贵州湄潭、山西大宁的试点村集体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由村干部、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村民代表组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小组,在界定成员资格的基础上,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资源、资金以及债权债务等进行清理,并登记造册,明确债权债务。按照“分户设股、一户一证、分户不增、并户不减”的原则完成清产核资、股份量化工作,促进还权赋能,确保农民群众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试点村的“四确五定”改革路径(“确权定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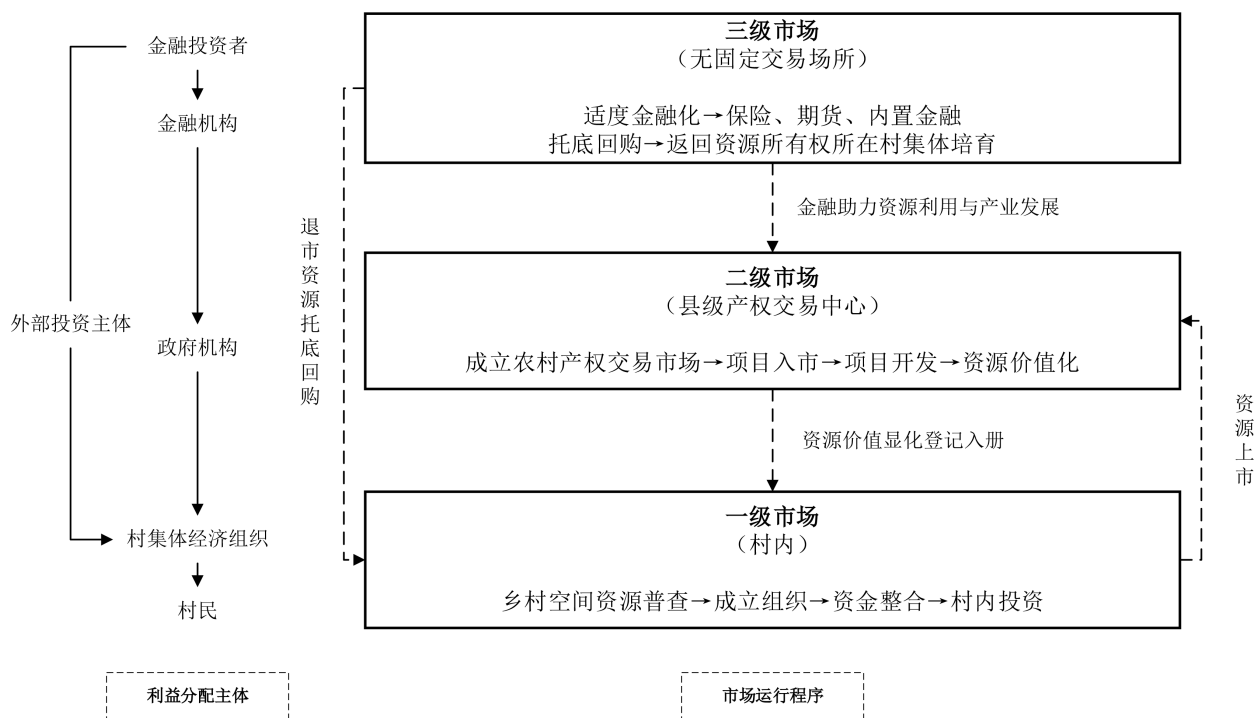


图3 三级市场的租利两得机制

产—确员定股东—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营、定平台”），作出了一级市场创设的重要尝试。

第二阶段，外部资金引入，发展创租，发展二级市场。资源盘活后，培养和吸引“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社会企业”下乡。以市民与农民联合创业为基础进行新乡贤治理，通过乡土百业发展体现城乡融合战略。在此基础上，设立县级产权交易平台，为发展二级市场作出尝试。

第三阶段，共治共享，成员分租，探索三级市场。“三变”改革构建了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村集体与外来资本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以确员定股的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租值共享，在实现农民组织化、提升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使村内成员共享增值红利。

各地乡村振兴实践中发展租值经济的尝试，使得乡村振兴由利润赚取为主的经济形态，正转向“租利两得”或以租值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发展。在创设一二三级市场过程中，将新兴经济形态确定下来，将增值收益留存本地，以此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四、结语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于18世纪，以此为基础，各类生产要素纷纷进入增长方程式。《国富论》奠定了整座经济学大厦的根基，带来了200多年来由自然秩序引起“自由放任”式利润经济的实践。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进入增长方程式，各类非劳动生产要素以及难以用人类劳动衡量的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不断对《国富论》的解释体系带来挑战。其中，非生产性获利的租值部分，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打补丁的方式，纳入以生产性获利为手段的利润经济理论中。本文站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除了生产性获利为主的利润赚取，更有非生产性获利为主的租值获取，由此提出租值经济和“租利两得”的新国富论。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主要来源，不仅仅是《国富论》所言的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要素发掘和利润赚取，还包括在资源既定条件下的租值发掘和租值获取。同时发展利润经济和租值经济，促进

“租利两得”,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国民财富的分析方法,不应局限于以利润赚取为核算目标的生产要素分析法,以及仅涵括一二三产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而应转换为包括租值获取为主要财富来源的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组合分析和超越生产要素分析的核算体系。本文提出包含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的租值经济核算体系和要素组合分析法,启发未来探索新国富论的经济核算方法。

第三,农村发展租值经济,需要区分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三类新型经济形态,找到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即通过社会增值放大自然增值的经济理论。乡村振兴要瞄准主要财富来源,确立农民产权地位,让农民进入“做大蛋糕”的租值获取过程中,从而以“租利两得”的经济实践,探索一条富国裕民的发展道路。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若干问题意图展开讨论,但又未能清楚阐明,只是作了一个开创性的探索。如下问题期待以后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由《国富论》奠基的经济学大厦,已有两三百年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现有的新国富论讨论,只是在生产性获利和非生产性获利这两类财富主要来源上作出区分,对财富性质和计量方式,还需要远超越现有文稿的讨论和建设,以使以租值为基础的财富来源能够得到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支持。

第二,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理论讨论,一方面,多数还停留在为《国富论》的增长方程式提供新的生产要素或寻找数字经济等第一生产要素层面^①,尚未从传统要素分析法进入要素组合分析法的新范式。数字作为一种新要素,终究需要回归到生产力的一般性质态属性中予以分析。对此,本文将这一讨论迁移到“租利两得”的新国富论的理论场景中,并对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作出区分。另一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讨论,除了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外,还包括新质生产关系的塑造,以及对新型生产方式的采纳、租值经济对利润经济的替代。现有讨论只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论场域,还有很多细致的论证功夫,是本文力有未逮,但又期待未来能作出进一步讨论的。

第三,礼失求诸野,学失也求诸野。乡村历来是中国和世界各类理论与实践的试验场,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农村开启一般。新国富论的“租利两得”实践,在中国不同地区已经有了零零星星的探索。对于这些实践,本文未能充分作出案例展示和剖析,这也期待通过未来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加以弥补。

(责任编辑:刘险峰;责任校对:舒隽)

^①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1期。